

經，但他個人的渴慕卻使他仔細去研究拉丁文的譯本，也因此他得了一個渾號「福音博士」。

一三四八年的十一月，黑死病橫虐倫敦，超過十萬人因而死亡，這天譴使威克里夫的心益發沉重，從讀經中，他得到在神裏面新的安息和信託；不久，他寫著：「因此，當我們還在罪中，仍作可怒之子的時候，神的兒子來，……為我們死了，如此我們就得蒙拯救，現在我們是在祂的血中得稱為義。」

畢業後，他被安排在貝力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作院長，該學院是牛津五個學院之一。除了擔負行政上的職責外，他還教授聖經，學生們擁擠在他的課堂內要聽他的宣講：「聖經是我們決定萬事最後的準繩 ---- 不是教皇。」

英國已有三十三年沒有付稅給教皇了，到一三六五年教皇烏以班五世(Pope Urban V)特修專函，催她付稅，愛德華三世召開國會，並把該信放在他們面前，當時威克里夫在場，他很可能還是一個深具影響力的發言人呢！明顯地當日官員的情緒都給威克里夫的演講煽起了。

一貴族站起來叫：「英國是靠刀劍得回來的，也是靠刀劍來保衛，讓教皇用武力來逼我們繳稅吧！我已預備好去抵抗了。」

全場一致地讚同這宣言，愛德華的國會就這樣公然反抗教皇了。「我們要英國的愛德華，拒絕羅馬的烏以班。」他們轟然說。對於國家的自由來說，這又跨進一步了。

威克里夫愈來愈勇敢，他特別注意到成群的托砵僧，正散佈在鄉村地方，他們身穿粗糙的羊毛黑長袍，故又稱為「黑衣托砵僧」，他們向人傳講的都是屬於神話及迷信一類的謬論。當他們向那些「忠誠的朋友」乞討時，他們總是自稱為「教皇的衛士」。他們不只一次地綁架孩子，然後把他們關在修道院內。一三三三年，牛津的名譽校長寫信給教皇：「自從他們被拐帶後家長們拒絕送他們的孩子進大學。」

威克里夫因著指控托砵僧五十種異端的罪及謬誤之處，而引起「聖人」們的烈怒。「托砵僧說他們的宗教比基督的宗教還來得全備，」他斥責著：「他們以假冒為善和強掠撒謊的手段，來勾引孩子加入他們的團體；他們生活儼如一大地主，卻遣派一些白癡去傳講神話，用謊言取悅人，又用武力搶掠老百姓。」毫不驚奇的，托砵僧當然想盡辦法要禁制威克里夫再宣傳下去了。

英皇指派六個皇家事務官去與教皇的密使商討教會的財產問題，威克里夫就是其中一員。完成職任後，愛德華皇帝特指派他為勒特倭得(Lutterworth)的教區長，這是英國最重要的教區之一，威克里夫得此重任，自然是因為愛德華賞識他有事奉的特別恩賜了。

一三七一年，國會提案說皇室應「革免政府內一切教長的職位，而以平民代之」，這議案之幕後策動人當然又是「福音博士」了。他的理由是：「教長的心若全被世俗的地主身份霸佔著，他根本就不能專心於研讀及傳講福音。」

威克里夫的講道及對國會的影響力引起主教們採取報復的大禍；一三七七年二月，倫敦主教庫爾特內(Courtenay)要他為自己的言論答辯，他去了，帶著當時

英國兩個最具勢力的人一同出席，結果議會只頒下禁令，不准他再講論「自己的教義」，便放他回去了。

「假如他是有罪的，爲何不會受罰呢？」那些好奇的人百思不得其解，「假如他是無知，爲何議會要拮制他的口，若他在地上是毫無權柄，那麼他在真理上是最堅強的嗎？」

新皇理察二世(Richard II)登基，威克里夫再度被召來幫助國會，那時羅馬教庭遷到法國的亞威農(Avignon)，一個法國的教皇要英國繳納稅項，而那時英國正與法國爭戰啊，納稅給法國豈不等於以經濟援助自己的敵國？威克里夫說：「我們的國家正需要貲財來保衛自己。」他也緊抓著這次機會質問教皇的權利問題：「使徒彼得怎可能把他自己根本沒有的東西傳給你？」

五度教皇諭令傳到英國，下令逮捕並審訊威克里夫，他被召到蘭伯特(Lambeth)大主教的華邸，威克里夫鎮靜地重覆他的信仰：「教皇不應在地上有領土」，而且「除了神的寬恕外，沒有人會得赦罪之恩，同樣的，除了被神定罪外，也沒有人會從神的救恩隔絕。」

教庭頒下第二度禁令，禁止他宣講「害人的道理」，但他不答應遵守。

一三七八年，羅馬教庭分裂，烏以班二世(Urban II)在梵帝崗(Vatican)執政，而革利免七世(Clement VII)則在法國的亞威農登上教皇的寶座。

一三八一年春天，「福音博士」在牛津標列十二論題指摘羅馬教庭的謬誤。第一題是否認聖餐中之餅和酒是基督真正的肉和血，「那只是祂的表徵而已。」他寫。

「異端！」宗教團體怒吼地回答，他們立刻在牛津召開會議；「這思想是屬於異端的，」這就是他們的決案。

威克里夫正在演講的時候，教庭官員進到他的課堂宣讀他們的判案。「你先得證實我是錯誤！」他回答：「我敢向反對我的人挑戰，看他們能反駁我的教義否。」

「你要就閉口，不然就進監牢，」他們說。

「那麼我會上訴國皇和國會，」他反辯道。

在國會被召開之前，威克里夫的死敵庫爾特內主教又召開一教會會議，他們從揀選的二十四條控罪中選了十條來定威克里夫的罪。他們特別強調的是「這錯謬的教義不准再在牛津宣講。」但那大學對所謂聖職人士沒有好感，庫爾特內主教便向國皇投訴，在政治環境的影響下，國皇終於同意主教了。他給他們權柄去把任何堅持己見，不肯悔改的人落在監裏。威克里夫屈順了，卻不沮喪，他引退去從事一生中最偉大的工作 ----- 爲一般平信徒把聖經譯成英文，和差派環遊傳教士在整個國家中宣揚那簡單的福音。

九百年前耶柔米的拉丁文聖經是當時唯一的聖經譯本，因著語文的障礙只有小部份的人能閱讀。

一些僧侶說聖經「對於平信徒是有害的」，但威克里夫卻說：「雖然現今有上百的教皇，和一切要擢升爲主教的托砵僧，但我們從他們又學得多少呢；會比我

們自己親自從福音書中得到的更多嗎？教會一切的信仰都在聖經裏面，因此明白愈多便愈好。」

他一個人翻譯新約聖經，舊約則由他的密友希爾佛得博士(Dr.Nicholas Hereford)翻譯，一部份則由威克里夫審訂。當時未有印刷術，因此他招募了一百名抄寫的人來抄副本，求過於供的情形立刻發生，幾個家庭常同用一副本。

爲要破除「黑衣托砵僧」的神話及迷信，威克里夫呼召信徒去向老百姓傳講真理，他們撇下了財產，跣足出發了，他們手拿竿杖，身穿粗衣，逢人便傳講神的道，人們圍攏著威克里夫的「可憐的傳教士」，飢渴地飲著生命的活水；他們在朦朧的光線下讀著寶貴的手抄本聖經，然後又傳給另一些乾渴的心靈。

一三八四年最後的一個主日，威克里夫正施行主的晚餐，突然中風昏倒，他的朋友扶他到床上，十二月三十一日便息勞了。

但他神聖的言行及榜樣卻永遠活著，他的跟隨者——羅拉得派(Lollards)——把聖經的教訓傳遍整個國家，而威克里夫的著作也成了壓迫下的歐洲人的寶貴遺產。

四十年後，在德國舉行的教會會議決定將他的骨頭掘出來火化，然後撒在附近的小川裏，從那裏流到河道，然後進入大洋，象徵著他革命性的言論傳播到其他地方去。這「自由的戰士——威克里夫」帶來的曙光，終於照遍了整個歐洲。

為最污穢的罪而設立的贖罪票，他們更從無知的農民收取巨額的款項送到羅馬教庭。

當時英國與波希米亞是由皇室間的聯婚來繫在一起的，因此兩國在知識上的交流便使到威克里夫的著作傳到布拉格；胡司很明白這個英國人的作品是被「定罪」的，而威克里夫本人也被判為「異端」，但這並不影響他要嚴肅地研讀這些作品的決心，他小心地比較威克里夫與聖經的立場，結果他看出這「異端」是發現了真理，他的結論是：人不必向神父告解仍然可以得救；基督比教皇更有權威，那真正蒙記念的是對祂的信心。

發現了這信仰，胡司不能緘默了，他渴望能把這簡單的救恩告訴他的同胞，他更冀望能恢復羅馬教會內純正的基督教。

門到底為他敞開了，一四〇二年伯大尼教堂的講壇懸空，該教堂是一有錢的貴胄牟爾海姆的約翰(John Mulheim)專為講道而設立的，他請胡司作那教堂的牧師，並鼓勵胡司可以按他的心意傳講神的話，胡司立刻開始在那裏講他從聖經得來的真理。

成千上萬的工匠，農民，商人與學生都擁到那地方去聽胡司講道，連皇后也坐在那裏專心地傾聽。

但反對也隨著興起，事緣一個大學教授向布拉格的大主教報告說：「那如瘟疫般的英國人威克里夫有好幾本書正在你的教區蔓延哩。」

僧侶警告胡司，並命他帶著威克里夫的作品回去見他，胡司立刻答應，帶著威克里夫的作品去了。

「閣下，」胡司謙遜地回答：「請你告訴我這些書錯誤的地方在那裏，我一定拒絕任何違反聖經和理智的事的。」

主教陰險地拒絕討論這件事，他奪過那些書籍，將它付諸一炬。更命令胡司不准再在禮拜堂講道。

「我是蒙神呼召的，」他反駁，「維護聖經的真理是我的責任和目的，即使是有生命的危險我也不顧。」

一四一〇年胡司專修公函上訴羅馬教皇，請求不再焚燒威克里夫的作品，但沒有得著答覆；一個月後，地方主教再燒掉另一套珍貴的書籍，立刻惹起贊成胡司的波希米亞人民的憤怒，皇后流淚，支持胡司的皇帝溫塞爾(Wenzel)則暴怒與咒罵，而主教在街上卻被嘲笑侮辱。

胡司在他那被「定罪」的講壇怒吼：「火不會燒掉真理的，只有小人才會拿這些無生命的東西來洩氣。」

羅馬教皇開始注意在伯大尼教堂傳講怪異的道理，他頒下召狀要傳胡司到羅馬，溫塞爾皇反對，他請求讓「胡司繼續自由地傳道，因為他是那樣忠義，虔敬和可愛。」

胡司繼續去傳道，置那召狀於腦後，一班受委託的紅衣主教宣告他被「革除教籍」，胡司立刻言簡意賅地回答：「我寧可順從神過於順從人。」

主教立刻停止布拉格一切宗教職權，整個城市被革除教籍，教會內一切公共的崇拜均被取消，只有臨死的人可以接受聖餐。

胡司卻立起一個堅定的信仰準則：「我已預備好要把我心裏的信仰告訴每一個人，我相信我的主耶穌基督，也願意為駁斥任何與基督和祂的教會有違反的地方而忍受任何殘酷的死刑。」

在羅馬，新的教皇約望廿三世(John XXIII)繼位，他對反對他的人宣告一咒詛，

並發一教皇諭旨，要每一個基督徒都「以經濟援助一支對付那不勒斯王喇地斯老斯(Ladislau, King of Naples)的神聖軍隊，凡捐助一個月工資的人均可獲得罪的赦免。」

「叫教皇學習基督的榜樣吧！」當胡司得知這諭令和售賣贖罪票時，他怒喝道：「赦罪完全是神的工作，這些贖罪票只是騙錢吧了！」

他的會友轟然贊同：「胡司講的是真理，他說得對。」很多學生護送胡司回家，並向他懇求：「不要離開我們，胡司，站穩吧！」

三個激烈的學生在布拉格的教堂站起來，向著正執行職務的神甫喝道：「你撒謊，教皇無理由可以揮軍討伐基督徒，他明明是錯的，我們的教師胡司教導我們比你們好得多了。」

這些學生被逮捕了，而且被判死刑，胡司雖不贊同他們的行動，但爲了他們的性命，他鑰請赦免；當時司法官本已答應不流他們的血，但胡司離開後，劊子手立刻砍掉那三個學生的頭顱，當這些血流到街上的時候，胡司的朋友才發現他們的背信。

胡司知道這血腥事件後，他冷酷地宣佈：「從今以後，羅馬的附從者與波希米亞的基督徒不可能再有交通的存在。」

一四一二年，一個公開與胡司爲敵的神甫說服教皇約望對胡司頒佈第二度開除教籍的諭旨，裏面說道：「任何布拉格的市民均可逮捕胡司，解送到大主教去焚燒，那異端的巢窟伯大尼教堂，也要拆毀，連根基都不留。」

皇后仍是堅固不渝地參加教堂內的聚會，皇帝則拒絕承認胡司被革除教籍；但另一班神學教授卻聯合起來，一同循正式手續來控告胡司；其罪狀是

- 一、 拒絕尊敬聖徒的骸骨及遺物。
- 二、 對聖禮及教會權威持有與羅馬歧異的見解。
- 三、 宣告神甫不能赦罪
- 四、 對於教皇所出售贖罪票來募集金錢去平亂的權柄表示懷疑。

胡司勇敢地向這些教授們挑戰：「我要在一個條件之下與你們公開辯論這些問題：你們與我同冒一樣的險——活活被焚，假如我們任何一方辯論輸了的話。」他們拒絕了他的提議。

胡司繼續在該堂內傳道。「基督是教會唯一的元首，」他宣告：「教皇的職位並不是必須的，因爲聖經中論及教會職事只有提到執事與長老。不是每一個祭司都是聖徒，但每一個聖徒都是祭司。」

「在彼得，保羅，約翰與雅各的書信中，他們只有問候教會和對她講鼓勵的話，卻從未定她的罪。他們也從不對人說：『給我錢。』」

德國皇帝西基斯門(Sigismund)對胡司的事情發生興趣，因此就在康士坦丁(Constane)籌備召開教會會議。西基斯門命令胡司出席該議會時，波希米亞的權貴人物立刻爲他們敬愛的牧者要求一紙安全通行證，他們也很快便答應了，貴胄們護送胡司過了國界，胡司寫信給在伯大尼他的羊群：「也許你們永不會再在布拉格見我的面了。」

當胡司抵達時，他的朋友問教皇約望胡司是否平安。「儘管胡司把我的兄弟都殺了，但他一根頭髮都不會受害。」教皇向他們保證。

胡司發覺他們沒有立刻給他機會公開地爲自己的信仰辯護，他有點失望了，在他等待期間，他每天都在自己的小房間舉行敬拜的聚會。

到他被召到大主教面前時，他的平靜被打破了，他們公然斥責他為一個「測心術士，魔術家，和卑鄙的異端者。」胡司答：「我沒有在黑暗中說過甚麼話，因此我希望能光明中回答控告我的人。」大主教要求把他下在監裏。「但那會破壞皇帝的信言了。」胡司的朋友黑盧姆(John De Chlum)致辯。

誓言被破壞了，胡司被關在一個地牢裏，其中有一條溝渠直通萊茵河。那溝渠的惡臭使他害了熱病。

在聖誕節那天，德國皇帝西基斯門到達了，受著教會領袖的壓力，使他不顧波希米亞貴胄的劇烈反對，要定他傳異端的罪。他們提醒皇帝發給了安全通行證給他，但皇帝囁嚅地回答：「也許行惡會給我們帶來幸運吧！」

直到一四一五年初，事情的進展仍很不順，忽然教皇約望發現議會對他不利，他立刻辭退並出走了，但卻在逃亡中被捕，他被議會革職並判下監，更滑稽的是與胡司同被關在一個牢房裏。

一四一五年六月五日，經過幾個月孤單的禁錮後，胡司被提到康士坦丁的佛蘭西斯修道院去接受審訊。

被拉到那五彩繽紛的議會上，他站在強烈的光線下眨著眼，他的身體因著熱病的磨折已十分虛弱，但他仍是直立在盛裝的貴胄面前，嚴厲的控訴正面臨胡司，他為自己的答辯都被喝止，當他被帶回監牢時，他寫信他的朋友們說：「求神使我堅立不搖。」

六月廿三日，胡司的著作被判焚燒，七月六日，在議會與皇帝面前，他被判火柱刑，聽到這判案後，他跪在地上禱告說：「主耶穌，饒恕我的仇敵。」

跟著，他們舉行了一個可恥的慶典，胡司受與耶穌相同的恥辱，羅馬教會的人把一頂長長的紙帽戴在他的頭上，上面畫著撒但正用牠的利爪來撕碎一個罪人，他們假裝敬虔地宣告：「現今我們把你的靈魂交給撒但。」

「但我卻將我的靈魂交給寶貴的主耶穌基督，」胡司回答：「我的主為我的緣故，無辜地戴上那更重更苦的荆棘冠，為何我——一個賤夫罪人——卻不能為他的名緣故，戴這輕省的紙冕呢？」

市長向劊子手怒喝：「帶他出去焚燒。」在街上幾千人跟著這隊伍走，當他們抵達刑場時，胡司禱告說：「噢，主啊！我倚靠祢，求祢使我永不蒙羞。」然後劊子手終止他的禱告，胡司站起來，欣愉地喊叫：「主耶穌基督啊，為了神聖的福音，我欣然地在羞辱中接受這可恥而殘忍的死亡。饒恕我的仇敵吧！」

他們再三叫他否認自己的信仰，當他清楚地拒絕後，他被捆在火刑柱上，火也燃點起來，當風把火與煙吹到他的臉上時，人還能聽見他唱道：「耶穌基督，永生神的兒子，憐憫我。」

火熄滅後，劊子手用一根棍打碎他的頭顱，然後把他的身體拋在隔鄰的萊茵河。

那天晚上，一些波希米亞人在火刑柱下掘了些泥土帶回布拉格，在那裏，胡司的見證更熾烈地燃燒著，一個強而有力的改教運動橫掃整個波希米亞。過了一百年，當路德讀完胡司的著作後，他寫著：「我們全是胡司的後人而不自知。」

情不自禁地喊叫起來：「我一定要爲自己和我的親屬帶著這裏的屬靈恩典回去。」

他參加各種瘋狂的活動，如告解，神龕前的彌撒，參觀羅馬地下瑩窟，和敬拜任何能找到的聖跡等；但是當時義大利神甫的輕浮和守彌撒時的不敬，叫他非常不悅。「快些啦！」當他全心全意地禱告時，他們常會不耐煩地催他。

他用雙膝，一步步地爬上聖梯，他們說這聖梯本是屬於耶路撒冷城內彼拉多的宮殿的呢。「假如我也爬耶穌曾爬過的梯級，我總會滿足神吧。」他對自己說。但心靈的平安離他仍遠。相反的，叫他耿耿於懷的仍是不夠敬虔，和教會母會的城市不潔，心靈裏終於帶著憂悒絕望回到德國去。

一五一二年，路德被任爲威登堡大學(Wittenberg University)的道德哲學教授，同年該校頒給他神學博士的學位。

路德更勤奮地研讀聖經；羅馬書，加拉太書和詩篇便變成他的一部份。慢慢的一線曙光在他心靈內出現了：神的義不單是神的屬性，祂更樂意在愛中賜給凡信靠祂的人：「整部聖經，甚至天堂，都爲我而開了。」路德歡呼。

這教授開始講解聖經，他寧可被稱爲聖經博士過於被稱爲神學博士，他也開始在演講中流露出德國人最智慧的思想。「我們不能因自己的行爲或守律法而得罪的赦免。」他們常聽到他這樣說：「耶穌已擔當我們的罪，我們只能單靠信來接受祂的恩典。」

在學術和宗教圈內，路德之名聲更爲顯赫，他出版的講章銷行甚快，以至後出版的尚未發行之前，先出版的就必須再印了。

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鬥爭開始明朗化了；遊客擁擠威登堡，要慶祝堡壘教堂(Castle Church)的週年記念，那天早上，學生發現在教堂大門上釘著一張寫上九十五條要討論的題目的文告，下面是路德教授的簽署。這文告大胆地向羅馬教會幾條重要的教義挑戰。

「在短短四個星期內這文告已傳遍整個有基督徒的地方，彷彿天使就是它的信差一樣。」當時在場的人寫著。

「呀，呀！」一個年老的教友喋喋而談：「要把我們教會和學校的黑暗趕出去的人來了！」

路德的九十五條是正面地打擊聲名狼籍的帖次勒(Tetzel)出售贖罪票一事，這奸詭詭詐錢的傢伙爲了替教皇搜括民脂，便在整個德國出售「任何罪和一切的罪」的赦免。

「銀錢在櫃叮噹響，靈魂脫離煉獄上天堂。」帖次勒向迷信的老百姓遊說。但當路德公開宣告說：「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不須要赦免的字條也能享受赦罪之樂。」帖次勒的收入立刻銳減了；因著得到教會領袖的支持，他怒吼說：「異端！」

有人請利歐教皇(Pope Leo)注意那些文告時，他輕鬆地回答。「噢，那只是些酗酒的德國人寫的吧！只要他清醒過來便會改口的了。」但無論如何，同年八月，教皇採取行動了：「限你在六十天內到羅馬來答辯異端的控訴。」教皇的諭旨上說。

路德知道去羅馬無異是送死的。他向有政治勢力的朋友智者腓勒德力親王(Prince Frederick The Wise)請求幫助，腓勒德力向利歐教皇請求「先讓路德在奧斯堡的羅馬教皇使節面前答辯。」教皇爲了不想加深本已存在於德國諸侯與教會之間的裂痕，他終於俯允了。路德從德國皇帝馬克西米良(Maximilian)接到安全通行證後，便會晤教皇的使節迦耶坦(Cajetan)。

「請指出我的錯誤來。」路德恭敬地要求；迦耶坦指出其中的兩點，路德開始他的辯論，但為大主教打斷了：「限你今天收回，不然你這文告全部要被定罪。」跟著的兩個聚會，都為使節堅決地拒絕。最後他們說：「收回，不然永不要回到我的眼前。」

一深夜，路德離開該城逃到威登堡去，整個德國屏息靜待教皇宣告的革除教籍令，但教皇卻決定慎重地等著。

不久，一個特出的神學家厄克博士(Dr.Eck)向路德的同僚迦勒斯大(Carlstadt)挑戰，路德在辯論中插入：「教會的元首是基督，沒有教皇與大主教，教會仍然可以存在；你們不應強迫基督徒去接受一些聖經沒有記載的教義。教會會議可能有錯誤，而且也實在已經犯過錯誤；只有聖經才是無誤的。」厄克在結束該爭論前，宣佈路德為異教徒和稅吏。

路德開始寫作了，他源源不斷地把訂單交給他的出版商。「你的意見可能會完全推翻幾個世紀來的傳統的。」他胆小的朋友們提醒他。

「管它，」路德反駁：「反正神的話必須居首位。」

一五二〇年六月十五日，教皇利歐第十(Pope Leo X)簽署一諭旨，要驅逐路德出羅馬教，並下令任何忠心的天主教徒無論何時看見他都可逮捕他。有權勢的腓勒德力親王卻保護他，並強調路德博士要接受公平的審訊。

馬克西米良駕崩，皇帝落在他的孫西班牙皇查理身上，為了報答路德在彌撒上的影響，聽皇帝告解的神甫召路德出席沃木斯會議(Diet of Worms)「去提供關於他的書和他的教義的資料。」

雖然他坐的是簡單蓬車，但在沃木斯卻受著迎接蓋世大君一樣的歡呼喝采。侍立在主教法庭上的都是德國最高級的人物，國君，王太子，以及教會的領袖等，此外就是陳列著一疊的書籍。

「這些都是我的書，」檢查過後，路德直認不諱。

路德不欲單以「是」或「不是」作答，因此，請求准以時間來考慮。他獲准考慮一夜，直到天明，他又要站在大會議面前了。他因著感情的激動而抖顫，他開始為自己的信仰作輝煌的辯護，以至反對他的人也不能不靜聽，直到他說完為止。

「我只是人，不是神，」他謙虛地在結束時說：「我希望你們從聖經找出證據來證明我的錯處！我會第一個把書扔在火裏，但除非聖經的證據說服我，不然半點我都不會收回，因為我不能作出違背良知的事。我就站在這裏，除此以外，我不會改變的了。」

路德的說話像地震一樣搖撼沃木斯，太子與貴冑們擠擁在路德的家裏，皇帝為了避免人民起暴亂，便延長路德的安全通行證。不過他終於簽署了逮捕路德及他的門人的御令，但這時路德已靜靜地離開該城了。

路德教授在那裏呢？被綁架了嗎？或是他已出國逃亡呢？他的敵人都撲個空，而路德卻安然地躲在深山一碉堡內，在有權勢的腓勒德力親王保護之下了。

儘管是躲起來，路德仍是忙得不可開交的；他開始把新約聖經譯成德文，二年後已在市場上發售，在短短五個月內，五千本全數銷售罄盡，這譯本才是普通老百姓所能閱讀的並與他們心靈相近的聖經啊。

路德已被革除會籍，並在皇帝之禁令下，但他仍是勇敢地從隱居的地方出來，回到他的大學教職去。對統治者的不滿和對敗譽的教會的反對在農民心底裏沸騰

。他回來後的幾個星期，暫時也能平息風暴，但後來就凌厲地爆發了，這風暴是混和著宗教激情和社會革命的意味的，這戰爭歇歇續續地在德國打了好幾年；雖然這樣，路德主義還是安全地被建立起來。

路德沒有意思要組織一個新的教會，而教皇卻強迫他們與羅馬教分開。皇帝召喚全德國人民去「反對路德主義的毒害，和引導那些錯誤的教友回到教會懷抱裏來。」

跟隨路德的人呈上一張正式的更正文(A Formal Protest)，因此這些不從國教的人便被稱為「更正教徒」(Protestants)了。

四十二歲那年，路德與迦他林·波臘(Katharina Von Bora)結婚，她原是一個修女。從朋友和敵人來的訾議紛紛臨到他，但這位改教家堅站他的立場。他盼望用自己的生活去證實婚姻的神聖，並恢復女人應有的地位；這宗婚姻實在是快樂而美滿的，他們有六個子女，但其中兩個夭折了。

一五四六年路德在他出生之地不遠處離世歸主了，他遺下很多正確的釋經書和其他學術性的著作，他最有名的詩歌之一「主是保障」(頌主聖歌四〇九首。譯者按)至今仍閃爍著著作堅信的光芒。在歷史上，少有人能如他那樣面對那種可畏的狂暴反對，而仍靠著神的力量得勝的。

,

那些明白在羅馬教會深被矛盾所困擾的朋友，都擁擠到加爾文的家裏，聽他重複地使用聖經的話來向羅馬教會挑戰：「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

逃往巴黎後，加爾文用了三年的時間週遊講學，作一個四海為家的教師；他到過法國南部，瑞士，義大利，最後到日內瓦。但當他抵達自己的故鄉那雲時，便立刻被捕入獄了，幸而數星期後便釋放了；之後，他公然地宣佈與羅馬天主教脫離關係，並加入了威克里夫，胡司，路德和其他改教家的陣線。

在納瓦爾的瑪嘉烈皇后(Queen Margaret of Navarre)保護下，加爾文與他的朋友路易丟提雷(Louis du Tillet)住在一起，他是一院的受薪僧侶。在這退穩期間，他開始把自己在基督教教義的立場寫成書，那就是「基督教原理」(Institutes)；他也幫助他的親戚阿立威坦(Olivetan)校訂與翻譯聖經為法文。

「在法國你不能再確保平安了，」一五三四年他的朋友告訴他：「假如你被捕，你可能會因信仰而被焚的。」加爾文接納了他們的提議，逃到瑞士的巴塞爾去。

「我從自己的出生地被趕逐，」加爾文悲嘆說：「從這國境起的每一步，都會使我淚涕千行。」在慈運理(Ulrich Zwingli)和法惹勒(William Farel)領導之下，巴塞爾早已成爲一個更正教的城市，他在那裏出版了基督教原理，在該書中，他清楚地把他從聖經中發現的真理都加闡明：如聖經的權威，人的敗壞，神的揀選，和因信稱義等道理。

法國的權威天主教人士要完全燒掉那些書籍，但他們那能敵得過出版的勢力呢，整個歐洲都流傳著他的作品；就在那年底，出版商已要求再版該書了。「我著手寫這本書，目的就是爲要滿足那些心靈饑渴地愛慕基督卻又苦無門路認識祂的人。」在扉頁他寫著。

基督教原理的單行本出版後，他便啓程往義大利，爲著受壓迫的同胞上訴於斐拉公爵夫人(Ferrara)，她是前法國皇帝之女兒。

公爵夫人歡迎他，但他的丈夫卻反對他，他又要逃命了。回到自己的家鄉，在那裏引領幾個親戚歸向基督，然後取道日內瓦往巴塞爾去了。

法惹勒是一個改教的傳道者，曾強而有力地影響日內瓦政府脫離羅馬的法律，現今又極力挽留加爾文留在日內瓦，幫助建立一個有系統的教會政體。

他們以日內瓦城需要他爲理由，終於說服了加爾文，他便留下與法惹勒起草政府的約章，他爲管理該城的居民建議了一些嚴格的紀律和道德的法則。爲此，一些有勢力的居民受不了，起而反抗他和法惹勒，他們便被迫離開該城，而日內瓦徹底的改教也因而延阻了三年，直到後來更正教徒在政府內得勢，才再邀請這些改教家回來。

這時候，市民同意了加爾文所建議的教會的管理與紀律的草案。就是教會不應與政府聯合，但這兩個團體卻要彼此幫助，這在理論上看來是有吸引力的，但實行起來，卻是困難重重呢。

在教會約章內，傳道人、教師、執事以至平信徒的職責都是清楚地寫明；婦女若跳舞便會被罰下獄，三個男人因在聽道時發笑而被判下監三天，一男孩子叫他的母親爲魔女而被遞解出境。但同時，他們發現儘管教會與國家的律法配合起來，也不能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

一個西班牙學者瑟維都(Michael Servetus)被羅馬天主教和改教宗同時宣佈爲異端，因而受極刑的處罰——死——因爲他激烈反對教會國家新政體所公認的信條。

瑟維都既被教會宣佈為異端，便被民政官員判了火刑柱的死刑。雖然在改教期間，更正教與天主教對於宗教上或政治上的滋事份子通常都是處以死刑，但瑟維都的處死，在今日的更正教看來，卻成了加爾文一生的污點。

加爾文對日內瓦的影響日漸顯著。他設立了一間神學研究院，這就是今天日內瓦大學的前身。歐洲各國之改教領袖紛紛到日內瓦來，然後帶著改教的感召回去自己的故鄉。蘇格蘭長老會剛毅無畏的改教領袖約翰·諾克斯(John Knox)記述他在加爾文領導之下的學校是「自使徒時代以來地上最完全的基督的學校。」

自一五六四年加爾文去世後，他的影響仍然透過其他的領袖和他自己的著作綿延至後世。按他的遺志，他的墳塋是沒有墓碑的，但他的生命卻如一座高聳雲霄的記念碑，說明了一個把自己的才幹獻給全能之神的生命，會有多大的成就。

壓制他的良知，他辭掉神甫的職位，並與羅馬教會斷絕關係。

初時，他勇敢地宣告他的信仰，只是沒有公開地參加重洗派的團體，但到一五三六年的年底——就在路德的德文聖經出版後第二年——門諾·西門斯便被逐離自己的家鄉，去到東面的格羅寧根(Groningen)，那地還未公開地逼害重洗派的信徒。西門斯在那裏接受荷蘭重洗派的領袖俄伯·腓力斯(Obbe Philips)的洗禮。

「西門斯弟兄，弟兄們想按立你作長老。」不久領袖告訴他。

「但我不配啊！」這個曾任神甫的回答：「我是那麼的無知，而我的肉體也實在軟弱。」他們卻堅持著，門諾·西門斯只好接受他們的按立了。

他與俄伯和德客·腓力斯(Dirk Philips)二弟兄一同傳道，施浸，寫作，按立長老，和幫助這增長不已的運動有六年之久，偶爾他也會悄悄地回到自己的鄉鎮。但在一五四二年查理士五世頒佈一諭旨：「禁止任何人接待門諾·西門斯進他的家，或留在他所有的房屋。」這宣告的意思是：「任何人等不得給他住宿，供應，與他談話，或閱讀他的作品。」凡違反這諭旨者均要受喪失生命和財產的刑罰。

西門斯隱退到荷蘭的東弗立蘭(East Friesland)，那地的統治者安娜女伯爵對重洗派是很有好感。一五四四年，他在德國的科倫一帶傳道和教學，那地寬宏大量的統治者容讓不從國教的人各按自己喜歡的去敬拜。直到一個羅馬天主教的統治者重得勢力後，門諾和他的妻子，小孩子便一同遷徙到波羅的海岸的維斯馬(Wismar)。

門諾發現出版人很難找到，但這百折不撓的傳道人卻小心地找到一些同情這自由教會的印刷工人，不久他的印刷所便開工了；「脫離羅馬教」一書便是解釋他離開天主教的理由，而「基本要道」則是表明他信仰的立場的書，這些都是他重要著作之一部份。

直到臨死時，西門斯僅保持著比逼害他的人領先一步之優勢。他對那些教義是正統而生活卻是偽善的基督徒的苛酷斥責，使他不大有歡迎；「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應該走在一條正直而窄的路，而不是寬大而敞開的路。」他告訴他的會友。

西門斯工作最有果效的年間，是他被人追捕的時間；在一五五五年，他寫著：「十八年之久今天我的家庭正遭遇極度的焦慮，反對，磨難，窮困，和迫害。我們一直被迫冒性命之險過著恐懼與隱居的生活。他們尊稱國家首長們為醫生，地主，或教師，卻稱我們為騎牆派的傳教士，騙子，和異端派，而且總是奉魔鬼的名來向我們打招呼。」

二年後，西門斯退隱於韋斯頓菲爾德(Wuesten Feld)，那是傍近丹麥好斯敦(Holstein)的一個重洗派的小村莊，在那裏，他安全地住在一個公爵的地土上。

一五六一年一月十三日，門諾·西門斯息勞了。如今，他的紀念碑仍矗立在上面覆蓋著美麗的橡樹林的小丘青草地上。

過了好多年代，人們才明白重洗派對宗教自由的教義。由羅哲·威廉斯(Roger Williams)帶到北美洲寶貴的自由就是西門斯教導他了；但那時，西門斯因著主張這個教義而常在火刑柱陰影下過活呢。現今超過二十萬的門諾派信徒——因這位獻身的荷蘭「騎牆派傳道人」而得名——和數百萬「自由教會」的教友，都該對這「使人得自由的真理」的戰士門諾·西門斯致敬啊！

「朋友，我是神復讎的使者，特來找你的。」魏沙特的朋友麥爾威勒(James Melville)大聲嘶叫著，然後一劍便刺入他的身上。之後，他們立刻關上城堡的門門，得了完全的控制權。

在政府要採取行動包圍城堡前，叛徒的家人及朋友已經擠堡壘的要塞裏，他們對政府是寧死不屈的，因此只有向外求援，希望英國能幫助他們；但與改教家同站一陣線的亨利第八在一五四七年一月廿七日已經駕崩。新的當政者不想，也實在不能對蘇格蘭的叛變有什麼幫助。

在諾克斯約翰正教導三個年青人的當兒，被圍困的城堡送來了急訊：「來參加我們吧！使我們的兒女可以在道理上受你的教益，而你也可得著城堡的蔭護。」

他進入城堡不久，謀叛的群眾便要求：「諾克斯約翰，請你擔任一些職位和傳道吧！」諾克斯勉為其難的應允下來。

圍城仍未解決，諾克斯警告那些叛眾：「你們敗壞的生活斷不能逃避神的審判的，你們以堅厚的城牆為矜誇，其實它們只不過好像蛋殼一樣吧了。別想英國會救援我們，我們快要落在敵人手裏，終被帶到一個素不相識的國土去。」

就在七月最後一天，城堡的守衛兵投降了，諾克斯與大多數的人被驅至一艘開往法國之低身船作奴僕，他們把好幾個領袖人物下在監裏，卻要諾克斯留在海上渡過寒冬。

「你要尊敬彌撒。」他的法籍主人命令他，但無論是船主的鞭笞，身體的羸弱，或是與罪犯同住的污穢侷促，都不能使這傳道者低首變節。

諾克斯仍在作船奴的時間，英國出兵討伐蘇格蘭；蘇格蘭國會向法國的亨利二世求援，一五四九年八月八日，法國宣告參予戰役，不到一年，便把英國人逐離蘇格蘭的領土了。

曾經預言自己要再度在聖安得烈斯講道的諾克斯，在和平談判中獲釋了，他立刻逃到英國去，在那裏，被委任為衛戍地柏立克的牧師。

那地雖然常有暴亂，騷擾和不安，但在英國國旗的保護之下，他建立起一個強而有力的教會；十二年後，他說：神賜予那本是目無法紀的地方的平靜，是「他不濟事的辛勞」的結果。

諾克斯攻擊彌撒，稱之為「可憎的事，是出於人意而不是照神的命令。」他粗魯而有權威的態度，和篤誠感人的講詞，開始引起新的英國教會領袖們注意。到一五五一年，他被委任命為皇族的牧師之一。隨後三年，是英國動亂不安的時間，革命與暴動無時或息，但諾克斯仍能自由地宣揚他的教義，對於罪惡，無論是貴族的或貧民的，他都痛加斥責。不久，英國的愛德華六世駕崩，由他的妹妹馬利·都鐸(Mary Tudor)登位，她是支持羅馬教會的人。

「在你被焚之前快點逃吧！」他的朋友帶淚向他懇求；結果諾克斯逃到瑞士，留下他的未婚妻波茲·瑪佐立(Marjorie Bowes)。

一個孤獨的流浪者漂泊異鄉，諾克斯深深地眷戀著他的故鄉蘇格蘭，以及他那心愛的瑪佐立。但同時他也多寫凌厲的單張，希望在家鄉引起革命的火花，他也盼望能藉這些單張，有機會與加爾文及其他的改教領袖會面相議。

就在逗留日內瓦的時間內，他被邀請到德國的法蘭克富(Frankfurt)的英國難民教會作牧師，他接受這個邀請。但上任幾個月後，便接到他未來岳母的懇求：「回到我們當中吧！」雖然是有點勉強，也不知將有什麼事情發生，他還是回到蘇格蘭去了。

諾克斯發現蘇格蘭是在吉斯的馬利(Mary of Guise)的政權之下，而她是一個信奉天主教的皇后的母親。人民在宗教的高壓政策下吃盡苦頭。自出娘胎到撒手塵寰，蘇格蘭人在羅馬鐵蹄下只是苟延殘生，尤其是要償還為死者做彌撒而欠下教會的債項時，他們更是百上加斤了。在這情形之下，多災多難的農工階級均暗暗為教會的改革和復興禱告，要推翻政府的革命思想在各秘密會社裏醞釀著。

完成婚禮後，他繼續工作，使他大得鼓勵的是他發現不少昔日的老會友至今仍是那樣的忠誠；「我看見弟兄們飢渴地愛慕著生命之糧，無時或息地歛歛呻吟要得飽足，」後來他這樣寫著。諾克斯約翰宣道的熱忱再度復甦了。

「我們不能僅僅從偶像崇拜的羅馬教庭脫離便算，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團契才行。」他告訴自己的弟兄說。諾克斯不能忘記加爾文在日內瓦的工作。後來他覺得，除了某些教義上他們是相異外，這些緊密地聯在一起的瑞士教會，實在是將來蘇格蘭教會的佳臬。

在這情緒下，諾克斯勇敢地把信徒組織成為有體系的教會，他們在家裏開會，在聚會中，他勸勉並教導他的弟兄。很多有影響力的蘇格蘭市民均跑來聽他講道。

自魏沙特的日子以來，這情形未有再出現過；主教開始注意到這件事，不出所料，他們要諾克斯出席在愛丁堡的教堂內舉行的會議，為自己答辯。

諾克斯偕他的新娘，以及她的母親再度逃往日內瓦，這次有兩年之久。在告別信內，他勸勉他的蘇格蘭弟兄說：「無論你們是在家中，或每週的聚會裏，也要靜靜地讀你們的聖經；在公禱上別忘記為君王和一切執政者禱告，為自由和基督的道得以傳開禱告，也要為我們落在苦難中的弟兄得安慰和得拯救禱告。」

在蘇格蘭，主教們因為不見諾克斯出席，便焚燒他的芻像來洩忿。但另外一更重要的爭辯發生了；假如吉斯的瑪麗逝世，而她又沒有子女，誰人去繼承她的王位呢？這時更正教團體的勢力開始坐大，他們一致要求國會通過要廢掉天主教的勢力。

為了報復，瑪麗凌厲地攻擊更正教的傳道人，用手段把國教一切屬於基要主義的因素均剷除淨盡，更傳召神的僕人到法庭受審，這逼使改革家立刻整頓自己的實力來與她分庭抗禮。一五五九年五三日，消息傳來：「諾克斯回國了。」這使她的銳氣大為挫減，她更瘋狂地去鞏固自己的勢力。

瑪麗最害怕的人果真回到愛丁堡來，且是在消息傳來的前一天，不出一個月，他已在聖安得烈斯禮拜堂的尖頂下研讀他的聖經了。

八個星期之後，六千個改教家進軍愛丁堡，由一個王子和三個公爵率領著，在這憤怒的行列前進的時候，很多人加入了，他們路過之處，修道院被搗壞，塑像被砍碎；街上一片頹垣敗瓦，整個蘇格蘭均擁擠著暴亂的群眾，他們在皇后的手下受盡苦害逼迫，諾克斯的回國無形中給予澎湃的怒潮有出路，以至這一觸即發的暴亂群眾如洪水般氾濫到整個城市，不可收拾。雖然這蓄著黑鬍子的傳道人並不贊同暴力，但他盼望已久的改革到底來到了，而且是雷霆萬鈞，勢不可當。

瑪麗為勢所迫，只得與叛亂的領袖進行談判：「假如德軍撤退，而我們又有宗教自由，我們便願意服從陛下。」這是他們條件。

瑪麗同意，但她也有要求：「甚麼時候我的御從來到蘇格蘭，你們便要舉行彌撒。」叛亂的領袖對此要求遲疑不決，但後來還是簽了和約。後來法國作了瑪麗的奧援，討伐亂軍，諾克斯為了報復，利用講道來振奮民心，使得有好幾十個蘇格蘭改教家公然宣告與女皇斷絕關係，不再效忠於皇朝。就在這時候，皇太后吉斯的瑪麗逝世

了。

叛亂的人不肯承認那在法國宮庭長大的蘇格蘭女皇，年輕的瑪麗。

一五六〇年八月，蘇格蘭執政團體請更正教呈上他們的信仰的表白書，那是由諾克斯和其他三個人擬稿的，很快便獲批准了。一星期後，國會廢棄教皇的權柄，取消了壓迫宗教的可憎規條，也訂定法律制裁參加彌撒的人。

同年十二月，蘇格蘭自由教會召開議會，草擬教會之管理及行政方案。他們把編寫「宗規首篇」(Book of Discipline)之功勞歸與諾克斯。該書指出會牧與長老均應由會眾選出。教會也應啓導幼愚，和憐恤貧弱等。這時教會興旺，連在蘇格蘭最偏僻的村落也有教會被建立起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看樣子諾克斯約翰是永無寧日的了，因為蘇格蘭的瑪麗皇后從法國回來了，並宣稱她才是皇位的合法繼承人。她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因此勒令要在宮廷內舉行彌撒；諾克斯約翰極力反對，她邀請他進宮解釋。

「你以為臣民可以反對一國之君嗎？」她冷冷地問，望著這消瘦憔悴，蓄著黑鬍子的改教家。

改教家泰然回答：「陛下，假如一國之君不守本位而超越應有的限制，他們是可以反對他，甚至可廢掉他。」

「看來我的人民應服從你，而不是我啦。」

「嗯，陛下，」諾克斯回答：「我們全應服從神並祂的教會。」

「我會保護羅馬教會的，因為我認為她才是神的真教會，」她雙眼閃爍著說。

諾克斯用他素常直言不諱的態度回答：「羅馬教會是一個淫婦。」

但在離開前，諾克斯對皇后說：「我祈望妳在蘇格蘭蒙福，正如底波拉在以色列一樣。」

一五六五年，蘇格蘭的瑪麗皇后與她的表兄弟達恩利亨利(Henry Darnley)結婚。他也是一個天主教徒。自此她對政府的行政加強了管制，反對她的更正教的地主都要逃亡。「不許諾克斯約翰再講道，」她下令說。

諾克斯回到英國，他兩個兒子均在那裏受教育。就在他離開蘇蘭的時間，皇夫達恩利在滿佈不利於他的謠言的宮庭裏被謀殺。皇后與她的情人波斯韋勒(Bothwell)結婚，但立刻給叛軍捕獲，並下在監裏。

剛勇無懼的諾克斯於一五六七年回來了，他領導政府去對付目前的危機，同時他也在新皇的加冕禮中講道。

瑪麗皇后逃獄，但不久便被捕回，並下在英國的牢獄，至終死在那裏。一五七〇年蘇格蘭的新王被暗殺了，內戰立刻爆發；同年在法國有七萬個法國更正教徒在聖巴多羅買節中被屠殺。

諾克斯當眾痛斥這謀殺事件，並投身在一激烈的爭論上，要求能給予自由教會在新政裏有一席之地。但到他得了癱瘓症後，他的朋友勸他到聖安得烈斯隱居並休息。在那裏他寫下他的遺囑說：「這世界厭棄我，我也厭棄它。」他的簽署是：「帶著癱瘓的手和喜樂的心的諾克斯約翰。」一五七二年，死亡臨到勇猛的諾克斯了。

這就是議論紛紜的傳道人的一生，一個政治家和改革家。蘇格蘭享受的自由與福音得助於他超過任何其他的人。被君王視為不法和異端，卻被蘇格蘭的弟兄與貴族愛戴的諾克斯約翰，終於使蘇格蘭成為改教信仰的碉堡。

第十二章

懷非特

——二大洲的木鐸

「看來整個世界都要宗教化了。」一七四〇年，懷非特在費城講道時，佛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這樣說。這個電力的發現者更注意「跳舞學校，會堂和音樂院都被關閉。」

但這個在十八世紀搖撼二大洲的神僕在英國的工作更叫人感動呢；當冷評家徹斯忒飛侯爵(Lord Chesterfield)親耳聽見懷非特形容一個瞎眼的人怎樣徘徊在懸崖斷壁上，然後他好像魂遊象外的突然起來，喊說：「他掉下去了。」這苛刻懷疑的侯爵說：「他真是我們這時代最傑出的人。」

這個被自己教會拒絕，卻能吸引三萬多人到草場來聽他講道的人是誰呢？他能力的秘訣又在那裏？他飽受仇敵的諷譏，也幾乎得著敬服他的人的崇拜。無論聖者，罪人，或是懷疑者對他均不能不加以注意。

在他三十五年的事奉裏面，常受著當時人對待循道會的人同等的待遇：投以穢物，擲以臭蛋。曾經有人想暗殺他，另一次，當他在波士頓附近傳道時，被人用一塊尖石塊擊中，傷得嚴重；躺在他自己的房間時又再度被兇徒襲擊，他尖叫：「謀殺呀！」驚動女主人及時召援，才挽救了這軟弱垂危的傳道者。另一次，一個鼓手決定與之為難，當懷非特在空曠地方講道的時候，他把鼓打得震天價响，蓋掉了懷非特講道的聲音，但懷非特終於說服他離開，說：「朋友……你的鼓聲可以替佐治皇帝或主耶穌基督招募到志願軍的，那麼爲了神的緣故，我們互不侵犯！這世界足夠容下我們二人的。」

懷非特佐治(George Whitefield)於一七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英國格羅斯特的柏爾旅館出生，家中七個孩子中他是排行最末，到兩歲那一年，他的爸爸懷非特多馬士(Thomas Whitefield)便去世了，八年後，他的母親再嫁，此後旅館的生意便每下愈況，到他十五歲便要綴學了，回家去「洗地，收拾房間，和替母親的顧客倒啤酒等。」

這個年輕的侍應生常會偷偷跑到南門獨立教會去聽柯爾先生(Mr.Cole)講道，散會後，便急忙地趕回旅店，模倣著「年老的柯爾」講道給客人聽。年輕的佐治曾在不少的公開演說中，贏得了幾個獎章，他酷愛戲劇，因此不少人相信，若不是神改變他的路線，懷非特很可能成爲英國最出色的演員。

他常在半夜起來讀聖經，他年輕的日子不可思議地交織著罪惡與懺悔，及至長大，他承認他「愛撒謊，喜淫詞，慣偷竊。」

「爲何不去牛津呢？」一天晚上他的朋友在酒吧這樣問他。

「我真盼望我能去啊，」他嚮往地說。一天早上，當他正向妹妹讀一戲劇時，他突然對她說：「神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事要交付予我。」

旅館的生意日漸清淡，一個年紀較大的哥哥接過來做，佐治與他意見不和而吵起來，便搬到布里斯托爾(Bristol)與他的母親同住。在那裏他賦閒在家。一天一個牛津的學生來找他，對他說：「在學期初所有的賬目付清後，我只餘下一便士。」

「這正合我的孩子，」懷非特太太說：「佐治，你願去牛津嗎？」她近乎哀求地問。

「媽，這正是我的心願呢。」他滿腔熱切地答。

這個替客人倒酒的孩童終於回到他的學校讀書了，在牛津的朋友均答應予以必要的援助。略事準備，佐治便啓程往牛津去半工讀。

往牛津之前，他已經風聞衛斯理兄弟及他們的「聖潔團」，他盼望能加入這個常被人提起的團契，但他一貧如洗，以至不能作什麼。

不久，衛斯理查理邀請他共進早餐，他欣然允諾，很快他便答應團契的領袖衛斯理約翰說：「我願依循規章來生活。」因此從十幾歲開始，懷非特每星期日均參加崇拜，每星期三和星期五則禁食，並探訪患病的，坐牢的。此外只閱讀屬靈書籍，每天行善最少一小時。爲要成爲聖潔，他常幾小時躺在床上歎息，或俯伏於地「懇求擺脫驕傲敗壞的思想。」「我常戴羊毛手套，穿東綴西補的長袍和骯髒的鞋子，」他後來這樣寫著。他雖然作了這一切事，心靈卻始終得不著平安。

直到二十歲，根據他自己的見證，他「哀愁的日子終止了，」「有人告訴我，當耶穌基督呼叫『我渴了』，他的痛苦已近尾聲；我投身在床，大聲喊叫：『我渴啊，我渴啊，』很快地我裏面感到重担得卸，哀傷的靈離我而去，我也真正明白何爲以神我的救主爲樂。」

懷非特繼續探訪坐牢的和貧窮的，只是他有一個新的信息了——新生。他自由地與其他宗派的信徒混在一起，這習慣在他一生的工作上都沒有改變過。「我愛每一個人，無論他屬於何宗何派，只要他是誠實地愛主耶穌基督。」他見證說。

他悔改後的熱誠迫使醫生不得不對他說：「你的宗教太強烈了，休息一會吧。」但那經歷三十五年仍不衰微的熱誠的火焰是不會冷卻不來的。反而增加了他的宗教活動，直到他的朋友要強逼他去「遵守聖潔的命令」爲止。

「直到我寫完第一百五十篇講章我才知道那真是神的旨意，」他說。

他被召到格羅斯特主教面前，聽他莊嚴地宣告：「雖然我曾明言我不會按立二十三歲以下的人，但我卻覺得無論你何時要接受按立禮，我都有責任爲你按立。」

懷非特終於同意接受按立爲英國教會的執事。雖然他說：「我汗如雨下地禱告了千多遍，除非是祂呼召我並驅使我，否則不要讓我進到教會去工作。」

跟著的星期天，他第一次講道了，「那個懷非特先生使得十五個人瘋狂了。」一個批評家向主教投訴。

主教微笑地對他說：「希望這瘋狂不會在下星期之前便淡忘吧。」

二十一歲的懷非特的聲譽如日中天般高照。當衛斯理約翰和衛斯理查理都航海往喬治亞洲(Georgia)時，懷非特的「重生」信息吸引聽眾擠滿了倫敦最大的禮拜堂。衛斯理從曠野寫信回來：「過來幫助我們吧！這裏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懷非特先生，假如你是一個這種工人，你該怎樣啊！」懷非特再一次把自己獻上，然後宣佈了他要渡洋的計劃。

「十二個月內你不能乘船。」權威人事告訴他，在這段時間之內，他作了一個「週遊的福音使者。」

這青年人的美麗聲音真成了英國教會的奮興與尷尬啊，後來他在日記上寫著：「重生的教義和因信稱義的道理如電光般射進聽者的良知去。」當他把要去喬治亞洲的意念告訴他的會眾後，「聚會完畢，成群的會友流淚跟著我回家，第二天，從早

上七時直到午夜，我都要忙於與他們談話，並給他們一些屬靈的鼓勵，以甦醒他們的心靈。」

懷非特啓航那天，衛斯理約翰搭然若失，垂頭喪氣地回來了。「我覺得神不要你去了。」衛斯理在匆促中潦草寫信給他說。但一個比衛斯理約翰更大的聲音正呼召著這個二十二歲的傳道者。

旅途中，懷非特每天早晨都在甲板上舉行崇拜，船駛抵大西洋中間時，兩艘護衛艦的人都參加晨曦崇拜。一七三七年五月七日，經過兩個月的海程，懷非特抵達薩凡那了(Savannah)。

懷非特的講道把整個喬治亞州都征服了，每一刻鐘他都忙得不可開交，他有一習慣：每當他打賞侍役時，他總給他一單張，或是幾句言簡意賅的見證。在騎馬時或客店裏，他常會唱起讚美詩來。「別人常在公共場所引吭高歌，」他解釋：「我們為何不唱唱詩篇呢？」

一七三八年的九月九日，懷非特登船取道回英國，凌厲的風暴使船駛離航線，「如今我們餘下的水只夠每人每日一品脫了，」他記錄著：「沒有人知我們身處何方，但神知道，那便足夠了。」第二天，陸地在望了，後來才知那是愛爾蘭，二十三歲的懷非特如今發現他的名字竟在全英國成爲家喻戶曉的了。

但在當時的教牧界正掀起反對他的風潮，很多教會均向他關門，原因是他與衛斯理兄弟爲朋友，並與他們的團契聯在一起。

十八世紀的英國正面臨著由工業革命帶來的經濟危機；男的，女的，甚至是小孩子都擁擠到工廠，磨坊和礦場去。那些地方的居住環境是十分原始和不合衛生的，過去一代的清教主義爲現今之公爵貴婦詈罵唾棄，而他們自己就是公開酗酒也恬不知耻，其道德低落之例證比比皆是：徹斯忒非爾德公爵竟認爲他有責任把「刁引手段作爲文雅教育所不可或缺的課程」來教導他的兒女。「賭博，」根據斯尉夫特(Swift)的看法，「是英國貴族致命的毒。」倫敦入黑之後，除非與一夥有武裝配備的人同行，否則不敢出門遠行。那時基督教正慢慢地潰爛腐朽，「一個重生的牧師稀如鳳毛。」他們把時間都消耗在獵狐，賭博，飲酒，和流連於戲院劇場之間。但在這黑暗掌權的時代中，神預備了一個偉大的三頭領導團——衛斯理兄弟和懷非特佐治——給英國人在道德生活和靈性生活上來個大復興，使以後的幾個世紀仍受其恩澤。

懷非特威嚴有能的聲音響徹英國，而教會的門也隨著向他關閉，使他所走的路愈來愈險惡了。在金斯武德荒蕪的礦區裏，他找不到一間禮拜堂，便只得站在漢咸山的小崗上來講道，那是他第一次在空曠地方對著二百多人的佈道。後來在他日記上寫著：「可能有人要非難我，但豈沒有原因的嗎？每一個講台都拒絕我，而可憐的礦工們卻因無法知道而淪於喪亡。」

這些貧苦的礦工被隔離在英國最低階層的社會裏，他們接觸不到基督教的信仰，因此現今有二萬多人群集在漢咸山麓聽懷非特的講道。「很快的幾百個礦工便被說服而深刻地自覺有罪，並顯著而徹底地悔改了，」他在日記裏這樣寫著。

「上面是無蓋的蒼天，前面是田野的景色，和擁擠著數以千計的聽眾：有些在馬背上，有些在樹上，他們都受感而一同流淚……看到這些光景真叫我難忍。」懷非特寫著。

約翰衛斯理聽聞群眾怎樣跟著懷非特到田野去講道，他不得不承認：「初時我對這種奇怪的傳道方法實在難以接受。我一向都堅持著行事爲人要循規蹈矩，所以我

幾乎認為不在禮拜堂內拯救靈魂便是一件罪。」後來，衛斯理兩兄弟也摒棄了禮拜堂內的講台，隨著懷非特到田野和草場上去了。

懷非特回到倫敦，他發現除了一間禮拜堂外，其他都向他關閉。他退到「摩爾廣場」去，那是一個平民公園。也是下流的娛樂場所，在那裏成千上萬的販夫走卒和紳官爵商均聚在該處聽他呼喊：「神已經差祂的兒子來……叫人得見能力不是出於人，乃是出於神。」他在肯寧吞公地向三萬個會眾講道，該地是英國最下流的人物雲集之處。「靠著神的幫助，我要繼續進攻撒但最堅固的營壘。」這個傳道者是言出必行的，他去到哈克尼窪田(Hackney Marsh)向一萬個為賽馬而來的群眾講道。

懷非特成了一個非常人物，沒有人會對他採取中立態度的，要就是朋友，不然就是敵人，開口論及他的，不是讚美就是咒罵。英國大多數的貴族男女都蔑視他，在講台上他被人譏笑為「斜視先生」，因為他那怪異的斜視眼，使他的聽眾以為他在注目看他們。一個深具影響力的杭丁頓女伯爵瑟萊那夫人(Lady Selina)公開地支持他，並邀請他到家裏向那些上流社會的人士講道。她用幔幕把一角落隔開，稱之為「尼哥底母閣」好讓那些教會中的知名人士坐在裏面聽道，而不為外界人看見。

一七三九年的八月，懷非特帶著款項啓程往美洲去，該款項是為要在喬治亞州建一座孤兒院而募集的，剛抵達他便立刻去費城，當時之賓夕法尼亞公報(Pennsylvania Gazette)報導：「上星期四，懷非特牧師開始在本城的州廳所走廊講道，約晚上六時，六千左右的人在凜然的靜默中等候著他，便雅憫·佛蘭克林對他甚感興趣，願意替他出版二冊的講章。」懷非特往紐約被安立甘教會拒絕了之後，在向南轉往殖民地中部前，他到田野去講道，在那裏他發覺與別處一樣，對他簡潔無華的講論，有人反對，也有人稱讚。

一七四〇年的春天，懷非特開始營建近薩凡那的畢士大孤兒院，這孤兒院歷時至今，成為全美國年代最古遠的一間。這孤兒院開始時只有四十個兒童。

現今他旅程的路線再折向北行，往殖民地的中部和北部去。幾千人擁擠到野地上——講道時夾雜著求憐憫的呼聲——這些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我視線所及，見到的大都是淚流滿面的人，」他記述說：「神的道比兩刃的利劍還要快，他們痛苦的呼叫與哀求足以刺進最剛硬的心……他們好像是被末日號筒喚醒的人一樣。」

當懷非特仍在麻省時，他探望約拿單·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他對愛德華滋夫人的暗羨使他的禱告也有了改變：「但願我也有一位如她一樣屬神的女兒作我的妻子。」一七四一年他回英國不久，便與一個寡婦叫詹姆士伊利沙伯(Elizabeth James)結婚了。但兩星期後，他又留下自己的新娘，僕僕風塵於旅途上傳揚神的道。雖然大部份時間懷非特夫人是孤單地留在家裏，她仍恆常地給予丈夫以鼓勵，忠貞與支持。

以後有三十年之久，懷非特的聲譽仍燦爛地閃耀。在英倫三島，他與衛斯理兄弟攜手合作，共同挽救那英國快淪於喪亡的不信與不道德之狂瀾。在美洲，他的講道為新大陸立下了屬靈的根基。在他常往返大西洋的海程中，不時面對風暴和盜賊的危險，但仍忠實地向船上的乘客與水手講道。他生活在海上的日子共計有七百八十二日。

他的旅程包括了二大洲，直至一七七〇年九月三十日才終止，就在那一日前，他的朋友曾力勸他說：「先生，現今你所迫切需要的，是躺在床上而不是上講台傳道了。」「是的，」不屈不撓的懷非特答道。然後他十指交叉緊握，雙目舉起望天，說：

「主耶穌，在祢的工作上我已疲乏了，但並非因它生厭，假如我仍未行完我的路程，讓我再到田野去為祢傳道，印證祢的真理，然後離世回家吧。」

在麻省的厄克塞忒(Exeter)，懷非特站在一大酒桶上講解神的話：「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我的旭日已升盡，靠著神的幫助也照亮了很多人，」他大聲疾呼：「現在它西沉了——不，它正升到不朽的榮耀的峰巔……我的身體衰弱了，但我的靈正在擴大，我多願意永遠活著來傳揚基督啊，但我死了是要與祂同在。」

翌日凌晨二時，他氣喘病突發，他開始為還未得救的人禱告，為在畢士大孤兒之家和為他在倫敦的會友禱告。五時，他告訴朋友說：「我快要死了。」六時，這個喚醒二大洲的神僕便離世去得他的獎賞了。

「懷非特死了！」城市報訊的人呼喊著，整個英國隨處可聞。一個教外的製帆匠苜達爾(Benjamin Randall)在朴次茅斯聽見了這惡噩號，他先前曾嘲笑懷非特及其講道，但現今他想：「懷非特死了，但他是在天堂，而我卻在往地獄之路奔跑。」這個製帆匠終於在基督面前降服，而後來還幫助了自由意志浸禮會的運動。

第十三章

愛德華滋

——神的號手

一七三五年，火傘高張的七月，康涅狄格(Connecticut)的恩非爾德(Enfield)居民蜂湧到聚會的房子裏，他們並未感到復興新英格蘭的火焰——那開始改變他們島上的無神思想的火焰，他們只是對這個復興的領袖充滿好奇，他就是約拿單·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是麻省北罕普吞(Northampton)內一個公理宗教會的牧師。

當他進場的時候，便受到會眾侮慢的低語和夾雜著粗野嘲笑的迎迓，更有一些露骨地表示其偽笑的歡迎。他被請來這裏講道時，剛在主領一個長老的聚會，時間是這樣短速以至他根本沒有機會作什麼準備，便從馱在馬上的皮囊取了一篇在一個月前曾在這裏用過的講章來講。

愛德華滋的習慣是把講章一字一字的讀出來。就在他那莊嚴的聲調讀出前幾句後，擾亂平伏了，寧靜滲進房間的每一個角落。先前譏弄講員的聽眾現今文風不動的坐著，張口聆聽；「你們只是抓著一根脆弱的繩子吧了，下面有神烈怒的火焰在跳躍著，你們找著的繩子隨時均可能被燒焦而焚燬。你沒有東西可抓著來救拔自己，也沒有什麼能救你脫離神的烈怒，你沒有能力拯救自己，你的善行不行，你根本是無能為力，神的烈怒必要臨到你。」

會眾有些緊抓著坐椅，有些不能控制地抖顫，在這長達二小時的講道中，很多人抽噎得利害，使講員不斷叫人保持安靜才能繼續下去。

那天愛德華滋的故鄉非爾德的市民歸向神的甚眾，有年長的，年幼的，貧窮的，富裕的。他們被復興的狂潮捲起，在以後幾年中，這狂潮從新英格蘭的南部直掃到其他國家，這個由愛德華滋領導，又為懷非特繼續的大奮興，使幾百間禮拜堂被建立，成千上萬的人棄假歸真，回到神的懷抱。

在歷史中，愛德華滋那篇「在烈怒的神手中之罪人」是十分有名的，但一些精明的傳記作家則更準確地形容他不單是一個有能力的傳道人，更是一個奇才，顯赫的殖民地領袖，敬虔的基督徒。其實單說他是一個只講「地獄之火」的傳道人是夠的，因為在恩非爾德的講道前數月，他就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來闡釋基督之愛，給他自己的會友帶來了復興。

愛德華滋不單是美國早期的奮興家，同時也是一個殷勤的牧者，傑出的神學家，有名的教育家，可敬的哲學家，和多產的作家，自他早期便顯出光燦的才華來。

一七〇三年十月五日他誕生的時期，這殖民地便飽受歐洲永無休止的衝突的苦害，邊陲長期落在戰爭的陰影中，整個殖民地的政治形勢是不穩定的，清教徒的領袖們集中全力在政治的問題上，以至宗教和道德均陷在低潮裏。因著他們採取「寬容政策」，以至很多未得救的人都得獲准加入教會，作「半個教友」——這便使教會成了良莠不齊的烏合之眾。

愛德華滋自十歲那年便開始寫一些關於昆蟲及自然科學的文章，並且論述詳盡。過人的好奇心使他的筆記簿充滿了問號：「我們有兩隻眼睛，為什麼不會看見雙重的影像？遠遠的山巒為何是藍色？」這些都是他急亟要知道的。在他廣博的興趣

中，植物學、動物學、生理學、地質學和天文物理等，只是其中的幾樣而已。

無論如何，科學不能滿足這煥發的奇才，因為科學只討論到一部份的知識，其表面的資料是不能解答充滿問號的腦袋的。愛德華滋要知道的是生命的整體。

轉到哲學，他的結論是：這個宇宙所要求的仍是一個「永遠存在的全知的叡智」；他更體會到「除了屬靈的快樂外，沒有快樂是可靠和有價值的。」當他十歲的時候，便記載了關於他對屬靈事物發生的興趣，那是受惠於其父親的教會的復興。他與他的同伴在沼澤中蓋了一間「禱告茅廬」。他也常常在樹林中與神交通。

年輕的時候，他已經有幾個頗有深度的屬靈經歷，其中較特出的可從他讀到提摩太前書第一章十七節中追尋到：「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的君主，獨一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他寫著：「當時我感到那神的榮耀進入我的心靈內，是我從未感受過或經驗過的，我就立刻禱告，求神使我對祂會感到快樂，我是用一新的愛慕來向祂祈求。」

年屆十三，他便考進康涅狄格州的哥尼基挨學校，後稱耶魯大學，當時他已可閱讀希臘文、希伯來文和拉丁文等。十七歲便以全班之冠的成績畢業；他再在該校進修兩年，預備作傳道的事工；之後，便在紐約一長老會教會作工八個月，再回到耶魯大學作講師。

在他這段忙於讀書，嚴於自律的時間裏，他掉進愛河裏了，對象是耶魯創辦人之一的女兒撒拉·皮耶爾蓬特(Sarah Pierrepont)。二十四歲那年，被其祖父所羅門·斯托達德(Solomon Stoddard)請去幫助他在麻省的北罕普吞公理宗教會的教務，那是一間全省內最興旺的內陸團體。六個月後便回到新港(New Haven)去與十七歲的撒拉小姐結婚。

一七二九年，他祖父息勞了，此後全教會的工作便落在他身上，他每天兩次把自己關在安靜的角落來禱告，另外用十三個鐘頭來自修，他的運動是散步，伐木，或騎馬，一邊作運動，也一邊默想。

他雖有十二個子女，但撒拉卻能使其丈夫的研究不被攪擾，尤其是無謂的閒談。當他有病時她侍候在側；平日她悉心料理他的飲食，家務更是照料得賢明有智。「她從不用大聲吆喝她的孩子的。」一個接近過她家庭的人說。仍未結婚的懷非特探望過這牧師宅後，說：「我從未見過比他們更親愛的夫妻。」

因向印第安人宣教而深受人敬重的神僕，大衛·卜萊納(David Brainerd)，看愛德華滋猶如親父一樣，卜萊納患了肺病後，便搬到他家裏來休養，在那裏得著愛德華滋的女兒，十七歲的耶路沙(Jerusha Edwards)護理，直到他離世歸主；在嚥下最後一口氣前，他輕輕地對耶路沙說：「我們將要一起享受這快樂的永恆了。」不久，耶路沙也隨而去世，葬在卜萊納的墓旁。

為表示他對這個準女婿的敬意，愛德華滋寫了一本關於宣教師的行傳，至今仍為廣大的讀者所愛閱。(其感人的生平中譯本有「拓荒先鋒」，證道出版社印行)

在北罕普吞的教會工作了七年，愛德華滋說：「神的靈開始異乎尋常地在我們中間工作。」硬心的罪人改邪歸正，城內的酒館門堪羅雀，全體會眾的靈命都活潑起來了。在六個月內，六百二十人的會友中差不多有一半都表示悔罪歸神。跟著，復興的火焰如草原的火一樣蔓延著，直至整個康涅狄格河流域都被其焚燒。

這火焰猛烈地焚燒了六個月，然後一度減弱，但不多久即在北罕普吞再度燃燒起來，時為一七四〇年。大復興誕生了，它成了殖民地最重要的屬靈發展，據估計

全殖民地六份之一的人民歸向主耶穌，人民的道德也得以重整，這些都是預備迎接將要面臨的國家獨立戰爭。

他在北罕普吞的二十四年中，常被困難包圍著，其中部份的原因是他對年青人的活動毫不留情地批評。

他特指出男女和衣睡在床上的壞習慣；他譴責說：「這是引我們到罪惡，並使我易於犯罪的行爲之一。」對於跳舞與淫猥的文字，他也是攻擊得不遺餘力。

他與會友中的領袖人物衝突的另一點，是關乎接納會友的問題。「我不能再心安理得地接納一個未真重生的會友進入教會。」他告訴太太說。「半個教友」的政策自他祖父的時代便已實行，加入了教會的人，除了選舉權外，便可以享受其他一切的利益。而這些人全沒有得救的見證的！

一些不滿意愛德華滋對年青人的批評的人，現今則乘機從他「半個教友」的主張找把柄攻擊他，要把他攆走。在一七五〇年，他們終於成功了，成功地攆走一個新英格蘭最偉大的領袖。

「現今我正被拋在茫茫的大洋中，不知道我和我的家庭將來的遭遇如何。」他說。經過六個月悶悶不樂的日子，他接受了麻省印第安人村落家畜橋(Stock Bridge)的一間教會的邀請。就這樣，他便在小小的移民中作起牧師來，他也在文盲的印第安人中負起傳道兼教師的工作。

有八年之久，這個殖民地最有學問的人在一個入息微薄得不足以維持家庭的地方工作，他的兒女爲要幫補家計，也得做些扇子和花邊拿到波士頓發賣。這種外表看來是「家道中落」的生活，在日後便看出是一個祝福來。那教會因教務較清閒，他也有多些時間來寫作，他寫了有名的「自由意志」(Freedom of the Will)；「原罪論」(Doctrine of Original Sin)；和其他的神學著作，這些書在以後兩個世紀中均大大影響著神學界的思想路線。

一七五七年，新澤西學院(College of New Jersey)——即現今之普林斯敦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董事們一致推舉他作院長，翌年他便就職了。

這時期，天花迅速地在學校漫延著，愛德華滋雖接了受注射，但因惹起併發症，天花仍然奪去他的生命。

他只擔任了兩個月的院長職位，便在其最有光燦的日子中死去了。但他的見證仍活著，如一個屬靈的巨人一樣地站著。他的生命與影響力幫助了這個殖民地的進步與繁榮。他記錄下來的經歷和著作，則成了這活力充沛的年青國家一份豐厚的屬靈遺產。

第十四章

衛斯理

—— 神的騎兵

他是一個牧師的兒子。十七歲便開始被人稱為「小個子」，在一生八十八個年頭中，從沒有超過五呎五吋，也沒有重過一百二十磅。

但這個一頭梳洗整齊的白髮，配上淡紅褐色眼睛的小個子，卻是拯救英國免於道德喪亡的屬靈巨人。他屬靈的能力帶來了空前的復興，也培育了循道主義的生長。一生從一七〇三年到一七九一年，無論在時間或影響上來說，在那時代中他都是其祖國最偉大的人。

他策馬去過二十五萬哩，講了四萬二千篇道，和寫了二百三十三本書。在七十四歲那年，他仍催他那匹冒汗如雨的班點駿馬在四十八小時內走了一百六十哩。八十四歲時他還騎馬在八十小時內走了二百四十哩。

這個循道會的創辦人出生於一非常的家庭，其父是英國厄普臥(Epworth)一個窮困卻是有學問的牧師，著有好幾本書，其母蘇撒拿(Susannah)是一個古典學者和語言學家，二十一年來，每天仍有充裕的時間去照料十九個孩子。在衛斯理蘇撒拿的家庭教育中，自律是最要緊的一門功課；約翰與他的兄弟們每天早晨與下午都是自修三個鐘頭，自從五歲開始，他便讀創世紀。不久便進修希臘文、拉丁文、希伯來文、數學、以至歷史等。

每天飲食起居均得嚴守時間，任何活動只准在規定的時間內進行，不然的話，他們知道是會受罰的。約翰日後的生活顯出，他從沒有脫離過他母親蘇撒拿自律訓練的影響。

約翰剛滿六歲，便得到有關他將來的另一個預兆的啓示。

時為一七〇九年二月七日的晚上，一陣猛烈的火焰吞沒了整座牧師住宅。蘇撒拿和衛斯理撒母耳帶著一家人逃出去，正數點人數，看有沒有人不見了。

「哎，約翰仍在火場呀！」他們說。

當約翰的頭突然在屋頂小閣的窗口出現時，他父親立刻向火焰衝去，但卻被濃煙和熱氣逼回。

「朋友，上我的肩頭去吧，」一旁觀的人大聲向他叫喊。一下子三個人便疊起一條梯子來，就在屋頂下塌前的一剎那，最上面的人已把孩子從窗口搶救出來。

後來，衛斯理約翰稱自己為「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

一七二〇年六月，衛斯理約翰便以自費生的身份被牛津大學取錄。在學校，他是一個成績出眾的學生，對於宗教，也只是平平無奇，直到一七二四年，他得到學位後，仍未決定應在那方面繼續研究。

「我至切的禱告是你能接受聖職，作你父親的副牧師。」他母親在信上這樣寫著。

在他接到母親的信的當兒，約翰正讀著一些感動他要作傳道的書。

其中感動他至深的書也許是由一個偏執的醫生寫的「健康與長生」。

「禁食是有益的，」醫生建議：「每早上來個冷水浴，然後騎馬或散步，對健康

大有幫助。」醫生也鼓勵早起的習慣。約翰把他的鬧鐘撥到四時，「靠著神的恩典，」六十年後他說：「我從未中斷。」

當約翰把他的感動告訴母親時，她提議說：「小心地察看自己，看你是否靠著耶穌基督有一個正當的盼望。」

約翰深以為然地聽從她的建議，他定下每週的計劃，包括每天兩小時的「退隱靈修」。「閒暇與我是拉不上關係的，」他寫給母親蘇撒拿。「而他們再沒有碰頭了，」一個傳記作家補充說。

他被選為林肯學院的院士，希臘文講師和各級的會長；不久，年老多病的父親便叫他回去助他一臂之力，約翰就這樣離開牛津，只作了短短三年的教牧工作，他所有的經驗就是這麼多。

當約翰重回牛津時，他的兄弟衛斯理查理正帶領一組律已甚嚴的人熱烈地追求公義。約翰加入，並作他們的領袖；他們的團契常被人嘲譏為「聖潔團」，「聖經虫」，「聖經迷」和「循道者」等。後來約翰在英文字典中解釋循道者為「依循聖經指示的道而生活的人」。

「聖潔團」規定每星期有兩天要分別出來禁食和禱告；他們立下詳細的規條來引導自己的意志。在最早的四個會員中的三個，衛斯理約翰，衛斯理查理、和懷非特喬治，都成了世界偉人。

死亡敲響了厄普臥的牧師寓所，衛斯理眾孩子被叫到父親的床沿。「孩子，內心的見證是基督教最強的佐證。」息勞之前，他低聲地對約翰說。

他把父親的事安排妥當後，便取道倫敦，把他哥哥最近完稿的解經書獻給卡羅來納皇后(Queen Caroline)。甫抵倫敦，便聽到喬治亞洲新殖民地需要一位宣教士，來把福音傳給當地的印第安人。

有查理作他的秘書，一七三五年十月十四日他便啓航前往了。「我此行之主要原因是希望能拯救我自己的靈魂。」動身前四天他這樣寫著。

在公海上他們遇上強烈的颶風。

船瘋狂地顛簸，一班約翰稱之為「蠢鈍傢伙」的莫拉維教友開始安詳地唱起詩篇來。如牆一樣的巨浪直打在甲板上，把主帆都打碎了，水往船艙傾下。英國人尖聲呼喊，而莫拉維教友仍繼續唱他們的詩篇。

「你們不害怕的嗎？」風浪平靜後，約翰問他們。

「不，」一個敬虔的人回答他，「我們不怕死亡。」

翌日，莫拉維的牧師施旁根堡(Spangenberg)與約翰談話，更叫他的思想迷惑。

「你認識耶穌基督嗎？衛斯理朋友，」他問。

「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約翰謙虛地回答。

「不錯，但你知道祂是否拯救了你呢？」

約翰啞啞地答：「我希望如此。」但他一直不能忘記莫拉維會友這句精警深徹的問話。

在喬治亞洲的工作並不如衛斯理約翰的理想，既感失敗，兩年後他便回到英國去。

「我去美國要引領印第安人歸主，但誰引領我歸主啊！」在他的日記上，他悲慟地寫著。「我所有的，只是一個順境時才心安的宗教。」

回到英國，約翰與查理偶然結識了莫拉維的宣教師彼得·波勒(Peter Bohler)。

「有什麼理由你希望可以得救。」一天，莫拉維的宣教師問查理。

「因為我是鞠躬盡瘁地侍奉神，」查理輕輕地答。

波勒不說什麼，只是悲哀地搖頭。

過了幾天，約翰聽說查理病得很厲害，他趕快去到他身傍。

「我發現波勒彼得和在牛津的弟兄們，都給我清楚地看見我是多麼缺少了信心。」他後來說。

約翰深受莫拉維宣教師的攪動，以至他計劃要「離開傳道的工作」。但波勒卻勸他「傳信心的信息，直到你得著為止。」

兩天後，約翰憑著信心把救恩傳給一個已被判決了的罪犯，其反應實在是感人，「我現在已預備好去死了，」罪犯見證說，「基督已經把我的罪除去。」

然後，過不了幾天，查理因著讀了路德的加拉太書釋義而完全相信了基督。

約翰仍在掙扎中，但他的時候快到了。一七三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他打開聖經，讀到「你離神的國不遠了」。

那天晚上，他參加一個福音派基督徒的聚會，當他聽到別人唸出路德寫的羅馬書的序言時。他感到心中有「奇怪的溫暖」。

「我感到在救恩上，我是單單依靠基督的，」他寫。

十八天後，他傳出了有名的講章：「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篇曾在牛津大學宣講過的信息後來成了衛斯理大復興的主題。

他得救後的第一個夏天，去探訪莫拉維會宣教師的領袖親岑多夫伯爵(Count Zinzendorf)。「單純點吧，我底弟兄，」這德國人就是如此簡單地勉勵約翰。他進而奉勸約翰在倫敦也成立一個如莫拉維團體的基督團契。

約翰的心靈被復興的熱情燃燒著，他緊抓著每一個機會去宣講這簡單的救恩信息，使得很多人歸向主，但也帶來不少其他傳道人的批評攔阻。到一七三八年年底，全倫敦就只有三四間禮拜堂的門是肯為他打開的。

約翰退到菲特小巷會(Fetter Lane Society)去，那是他接納莫拉維弟兄的建議而設立的。一七三八年的除夕，他們正舉行守歲夜祈禱會，衛斯理詳錄當時的情形：「約在凌晨三時，神的能力厲害地臨到我們，很多人快樂地高呼，也有人仆倒在地，我們異口同聲地說：『神啊，我們讚美祢。』」

這個禱告會實在是衛斯理廣大的事奉的開始，一七三九年四月二日，衛斯理約翰跟隨懷非特同到田野間佈道。他第一篇講章的經文是「主的靈在我身上」。

布里斯托耳的名牧蒲脫勒主教(Bishop Butler)向衛斯理挑戰，要他出席一個辯論會，「你與懷非特都是騙子，」他指控衛斯理。

當辯論愈來愈熾熱時，衛斯理安靜地問：「那麼你以為我當怎樣行呢？」

「我勸你從此離開我的教區，」主教怒吼著。

衛斯理仍是安詳地反駁他：「我在地上的份就是盡我所能的去行善，我是普世教會的牧者，我應該聽從神或是聽從人呢？」

約翰的大哥撒母耳也表示對他的田間傳道深覺震驚。

下面就是約翰有名的回答：「神命令我去教導無知的，改變敗壞的，和堅固善良的，人卻禁止我在別人的教區如此行，但我看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區啊！」

當約翰和查理開始在學校的房屋內施行聖禮時，更多的聖公會牧師起而攻擊他們，在倫敦他們被召到眾主教面前，但教會高階層人物嚴厲的申斥，不能阻遏那橫

掃整個城市的衛斯理的復興。

約翰探訪他父親往日的教區厄普臥，和他自己的故鄉。在一聚會中他自動請纓要幫助那地的教區長羅姆里先生(Mr.Romley)，但被拒絕了。另一面，群眾卻聚在一起希望聽到他的講道，結果他們只聽到教區長反對宗教熱誠的說話。

到會眾魚貫離開禮拜堂時，他們聽到佈告說衛斯理約翰將於晚上六時在教堂的墳場講道。

聚會中，約翰用他父親的墓碑作講壇，好使會眾能看見他。在會眾的堅持下，結果他在另外的六個晚上也要爬上那塊墓碑上呢！最後一次聚會結束後，他的聲音全被那些要得救的人的呼求所淹蓋。「我清楚知道，」後來他說：「我在父親的墓上講三日道勝於在他的講臺講三年。」

因此衛斯理約翰和教會的裂痕便繼續加深。

一七三九年的秋天，嚴寒的天氣使這個田野佈道家不得不在倫敦一間荒棄的工廠內開聚會。這座古老的建築物不久便被買下，成為這個復興運動的總部。

當跟隨他的人不斷增加時，衛斯理約翰便顯出他在組織上的特長來；他把大的團體分為較小的工作單位，稱之為「班」，每一班有一「班長」，是直接向衛斯理負責的。

不久他開始在信徒中揀選一些人作傳道工作，並派他們「出去到路上和籬笆那裏」來作他的助手。

衛斯理的聲譽上升，反對他的怒潮也掀起。二千多人聚攏要聽他講道，搗亂的群眾也不少。他被人投擲雞蛋和石頭；一次，他從一高牆上被人推了下來，便到警察局投訴，要求保護，他們冷冷地回答他：「你們這些循道派的人應對這些暴亂負責，因此你只好自己尋求解決。」

又一次，約翰正忙著寫作，暴徒用力敲他的門，要「把傳道人揪出來！」

約翰卻有禮貌地邀請幾個領袖入去，坐在椅上他安靜地問：「你要我作什麼呢？」

「與我們到法官去，」其中一個呼喝道。

「好的，」約翰謙卑地回答。

當這傳道人離開時，他被暴徒圍著，但其中一個領袖清楚地說：「他是一個誠實的君子，我們願意為他赴湯蹈火。」

在法院內，法官開門見山地問：「對衛斯理約翰有什麼事要我辦呢？」

一段長長的沉默，然後其中一人遲疑地和盤托出：「老實說，大人，我發現他一切的錯只在他講的道比我們的牧師好。」

「他使人在凌晨五時便起來唱詩篇，」另外一個插口說。

「回家，別再滋事。」就這樣決定了。

但另外一些暴徒卻在衛斯理和他的新朋友回家時遇上了，傳道人的口部被人殘暴地擊傷，當他被人拖曳而過時，血從他的傷口噴出來。

在市長的門前，約翰被鬆了綁，但卻不許他進入去。

「殺死他！」群眾呼叫著，他則靠在門邊，因失血過多而感到暈眩。

約翰開始竭盡所能地大聲禱告，一個彪形大漢勇敢地走到他身傍，「先生，我會用我的生命來保護你，跟我到安全的地方去吧！」

逼害不單沒有挫減循道會友的勇氣，反而增加了他們的聲望，無論衛斯理在什麼時候講道，總會有一大堆人聚攏在一起的，那怕是凌晨五點鐘。

或在馬背上，或是徒步，他總是不停地旅行。在旅程中，他便閱讀或預備講章，每年他大約會寫上八百篇講章，真是不可置信。

他足跡踏遍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士，每處地方的工作都是果實纍纍的。反對與逼害不能勝過他剛毅有力的講道。

與懷非特不同的地方是，衛斯理約翰從來不讓他的熱心超越他的實際方法；他不斷地委派傳道人和設立會社，在他離世前，已經有超過十三萬人在他會社的名下，這還不把美洲的計算在內呢！

無論友敵對他的自律均感佩服的，因為連那不愉快的婚姻也不能穿破他屬靈的甲冑。

其恆心也叫人驚歎不已，到八十高齡時，他見證說：「我覺得現在與二十五歲時同樣有力，我認為要歸功於：(一)神的能力，使我能配上祂的呼召。(二)每年恆久不渝地保持超過四千哩路程的旅行。(三)無論日夜均能酣睡。(四)在規定的時間起床。(五)沒有停止的講道。(六)感情的平衡，我對任何事都不掛慮的。」

八十七歲那年，他皺紋的臉上仍掛著勝利的微笑，但他承認：「現在我是一個老叟了，我的眼睛模糊，右手也抖得厲害。」「不過，」他補充說：「感謝神，在工作上我並未鬆弛下來，我仍然能講道和寫作。」

一七九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這個不屈不撓的年老十架戰士在城市道禮拜堂講了他最後一篇講詞，其經文是「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這正是一生工作的負擔哩。

自此以後，他健康狀況開始慢慢的衰弱下去。到月底，他必要臥床了，一天，他想拿筆來寫，但已經力不從心；「我替你寫，先生，」他的朋友自願幫忙，「告訴我你要說什麼吧。」

「沒什麼，只說神是與我們同在，」這堅強的老人微聲說。當朋友們擠到房間來向他說再見時，只聽見他一遍又一遍地說：「我讚美祢，我仍要讚美祢。」

他去世後多年，史坦利牧師(Dean Stanley)去訪葬衛斯理的墓園，問看守的人說：「這個墓園是誰主持奉獻禮的呢？」

守園的人的回答是言簡意賅的：「主持奉獻禮的，是神的聖僕衛斯理約翰的骨頭。」

其實歷史可以指出衛斯理約翰所作的是遠超過奉獻一座英國的墳場。歷史家一致認為英國在靈性與德性最敗落的時候，他成了復興的工具，使英國在靈性與德性上有一個新生。

他也被譽為循道會的創立人，雖然在他離世前仍說：「我或生或死都是英國教會的會友。」

第十五章

克利威廉

——印度路使徒

「沒用處的，克利先生，」英國的帆船船長坦白地告訴他，「我可不敢冒這個險帶你和你的朋友到印度了。」

聽見這些話，皮鞋匠的眼淚淌下了。「求求你吧！你不知道那對我們和社會是多重要。」

「假如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發現我私運傳教士入印度，他們會把我革職的。」這個剛毅的船長仍堅持著，絲毫不為所動，「把你的行李從船上拿回去吧。」

克利威廉(William Carey)只得拿著他的行李離開了，站在朴次茅斯船塢，他一直望著船慢慢地消失在海峽的濃霧裏。「無論如何，我始終相信神會帶我們去印度的。」他喃喃地對他的同工，多馬約翰醫生(Dr. John Thomas)說，「我們去倫敦吧。」他毅然地決定。

當他們坐著馬車往倫敦的途中，他們又奮力與困難搏鬥。「讓我們直接去東印度公司，要求他們允准我們吧！」克利建議；但他清楚知道該公司與英國是訂了合約，監管英國在印度的一切利益，因此是絕不會寬容的，他們不變的政策是：「不許任何宣教士進入印度。」

抵達倫敦，他們便分頭進行；克利寫信給浸信會宣教差會，多馬則走到一咖啡店去，希望萬一有機會能聽到外國船取航印度的消息。

克利的朋友逕自走到海員通常聚集的地方，直截了當地把他的問題提出來：「不，我們不曉得有船要出海。」但一個偶然聽到他問題的侍者卻暗暗把一張卡片塞在他的手中。

丹麥東印度貿易商船

一坎農街十號

多馬把卡片上的字讀了又讀，然後趕到那裏。「是的，瑪利亞號將碇泊在多維塢，她將要去印度，」那人明確地答覆他；「可以載乘客。」

他立刻把這好消息告訴克利，二人便衝出克利在皮丁吞(Piddington)的家，在這件事之前，克利的太太是不肯跟他們同到印度去的，但現在她同意了。一七九三年六月十三日之清晨，當克利威廉一家和約翰多馬代表著浸信會宣教差會啓航往印度作宣教士時，教會的新紀元就開始了。

前面的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但這個發動了近代宣教運動的克利威廉卻可勝任這工作的，因為他是一個有異象，又是全心倚靠神的人。其實遠在他被差派為宣教士之前，已顯出他是屬於這一類型的人了。

克利的童年是在保勒斯蒲雷(Paulers Pury)渡過的，那是英國中部一個崗巒環抱，樹木參天的小村莊，他父親是鄉村的驛官並兼任教區之書記。當他還在年幼的時候，自然科學和地理的興趣完全把他的心思佔有著。他的房間到處都是雀鳥與昆蟲。並且也是父親的花園的經理人了。他從不間斷地閱讀，尤愛那些探險的札記，

因著他太喜歡講及偉大探險家的事蹟，村人都稱他為「哥倫布」。

十四歲那年，英國的陽光對他面部和手部的皮膚產生厲害的反應，以至他不得不放棄農業的操作。「我已替你在皮丁吞的補鞋匠尼哥爾斯先生處找到一份學徒的工作。」一天他父親對他說。就這樣，十六歲的克利把幾件衣服捆成一束便住進一間鞋店了。

在那裏，克利畫了一張大的世界地圖，掛在工作枱的後面，同時留意當時發生的大事：諸如美國獨立戰爭的爆發；英國飽受國內革命的威脅，和從印度，非洲，南海等地回來的英國探險家帶來的消息等等，這些均大大引起克利更要多明白這個不斷擴大的世界的欲望。當探險家把新的資料帶回英國，克利便根據他在地圖上的國家來把資料分類，他開始研究丹麥、西班牙、法國和葡萄牙等。在中學他已學過拉丁文了。

晚上當村民經過補鞋店，看見克利的燈仍在亮著，他們不禁暗暗竊笑。「嗯，可憐的補鞋匠，你要讀這麼多種語言幹什麼？」一顧客問。

「這個世界正需要各個國籍的人去幫助彼此間的諒解。」年紀輕輕的補鞋匠回答他。「我希望能操別的方言，好去了解別種族的人。」

好學不倦的克利無論找到什麼都仔細加以研讀的，他得到一篇耶利米·推勒(Jeremy Taylor)的講章，裏面神聖而清晰的信息影響他極深，他把裏面的負擔與他的夥伴威廉·窩爾(William Warr)商量，威廉是參加那些不奉國教的教會的。

「你必須重生。」窩爾一針見血地告訴他。

「但我老早就是教友啊，」克利試圖反駁，「我還曾當過兒童詩班的班員呢。」

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這兩個學徒都在辯論英國國教和不奉國教者的分別，「你一定會喜歡我們教會的聚會，」窩爾向他保證，「我們一點沒有那些枯乾迂腐的儀式。」

克利終於屈服，隨窩爾參加他們的聚會，但他仍未能立刻承認不奉國教者對重生教義的看法是正確的。「每星期天我去教堂三次，也決定不再撒謊和起誓。」他痛下決心，但平安離他仍遠。

不久，英國與法國和西班牙開戰，敵人的艦隊盤守著海峽，英皇佐治下令一七七九年二月十日為全國的禁食祈禱日；那天，克利參加了不奉國教者舉行的特別聚會，他們的牧者多馬·遮打(Thomas Chater)講及跟隨基督的代價，克利寫道：「我有一個跟隨基督的心願。」不久，他見證說：「我感到敗壞與無力。」從這點，他離接受基督為救主只不過是一步吧了。

悔改重生後，克利威廉深感對聖經的認識不夠，因此他不惜捱飢抵餓去買些昂貴的書來讀。他不能滿足於英文譯本怎樣怎樣說，他更要探究到底原來的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的真義是什麼。早上他守晨更時，便是讀希臘文，拉丁文和希伯來文的聖經了。

一七七九年克利的老闆死了，這使他可以從學徒服役之年期釋放出來，他與俄爾德多馬合夥，兩年後，俄爾德去世了，那時克利剛與多若提亞·普拉克特(Dorothy Placket)結婚，他便自己掛起招牌來：

收買並出售舊皮鞋

一七八二年的一個夏日，克利不夠錢吃午飯，便去參加俄爾尼浸信會的聚會，剛巧那處的朋友邀請他共進午餐；二星期後，他再接到另一個邀請：「請來我們在巴爾屯(Barton)聚會的地方講道。」此後有三年半的時間。巴爾屯的人每兩個月便邀

請他去講一次道。這些講道的機會叫他比以前更勤奮地研讀，在他的語言學上，他又增加了義大利文一科，他坐下工作時，前面永遠是放著一本書的，即使爲了生意而出差，他也把握著每一個機會來閱讀的。

在小小的工作間，他身穿工作服和皮圍裙，口中咬著幾口鐵釘，他一面安靜地工作，一面便瀏覽放在前面的書，無怪乎有人稱他的小屋爲「克利學院」了。

後來到他年事已高，又是世界聞名時，他對他的外甥說：「假如有人要寫我的生平，他們可以譽我爲一個苦幹的人，僅此而已，若再多寫便是過分了。我能孜孜不倦，對任何研究都可以不屈不撓地保持著，因此對此讚譽我是當之無愧的。」

克利是清貧的，但他能耐勞，無論是生意清淡或他孩子的死亡都不能減弱他對知識的渴慕追求。爲要增補收入，他在屋子裏另闢一小室作村童的夜校，每晚學校放了學，他的鄰居仍見他挑燈夜讀，直至深夜。

爲要幫助他的學生明白地理，他用生皮作成一個地球儀，在上面畫上各個國家。他仍保持著閱讀遊記的習慣，後來他說：「我最初對宣教的主意是被「庫克船長之最後旅程」(Last Volage of Captain Cook)一書挑起的。」別些人從這書只會讀到歷險驚奇的故事，克利則看見人的需要。這些紋身的野蠻民族也是神造的，他們也是需要得救。他愈讀有關其他地方和人物一類書籍，他要作宣教師的負擔便愈重。在他自己繪製的地圖上，他把他所知道各個民族的宗教情況都寫了上去。

一七八六年八月十日，他正式被委派爲浸信會的傳道人，幾星期後，他出席在諾桑普頓(Northampton)舉行的傳教士聚會，在聚會中，一個年紀較高的傳教士要每一組提出一題目作討論，克利遲疑地站起來：「今天大使命是否也要我們去並教導萬國？」還未有人開口回答，聚會的負責人便公開地責難克利：「坐下，年青人，假如神要異邦人得救，祂自己勝任有餘，倒不用你我操心呢。」克利無話可說，但也只不過是當時而已。

他開始小心地爲自己的見地整理他的思想，在講道與日常談話中，他都把他對於世界的需要的認識告訴別人，傳道人和教會的領袖都搖頭說：「年青的克利那時才會放棄自己愚蠢的看法呢？他們彼此對問。」

克利堅持著說：「難道現今人的靈魂比以前的貶值了嗎？」他在一傳道人退修會中哀告著：「現在再沒有機會……把福音傳到異邦了嗎？現今的情況是我們只在這裏呆等，因爲我們不知道……我們爲世界能歸向主禱告，但我們忘記了那可以把福音傳出去普通工具……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

終於，在一七九二年五月三十日，克利寶貴的一刻來到了，他被邀請在諾桑普頓的浸信會之傳道人會社中講道，他傳了一篇劃時代的信息。年輕而禿頭，戴著一個不相稱的假髮，和長期在鞋店彎著腰工作而做成的佝背，加上矮小而瘦削 -----他在講台上的樣子實在不夠氣派的，但他心中卻熊熊地燃燒著一篇信息。他引用以賽亞書五十四章二、三節而把他的信息分爲兩半：「向神求大事，爲神作大事。」第二天，他要求：「讓我們討論如何組織一個宣教差會吧！」

「那是不可能的，」同工告訴他。這補鞋匠抓著-----安德烈·富勒(Andrew Fuller)的臂，並失望地問：「難道我們又一事無成地分手嗎？」其他的傳道人都靜下來聽克利繼續懇求，散會前，他們終於軟下來，並同意在下次聚會要「草擬成立浸信會差會來把福音傳到異邦去。」

一七九二年十月二日十二個傳教士，一個學生和一個平信徒同在窩利斯寡婦的

家中聚會，那地方後來成爲有名的「福音客棧」。在火熱的克利引導之下，他們聯合起來組織一個宣教差會，他們全部資金不超過美金一百元，但克利歡天喜地回家了。

就在第二年，克利威廉便與他的家庭同坐一艘丹麥帆船往印度。經過五個月疲倦的海程，克利才看見印度的海岸，但他可以登陸嗎？他清楚知道國會議案宣告：「沒有入境證的英籍人若在東印度被發現，必被罰款坐牢。」克利一行人都沒有入境證，幸而該丹麥船的船長同情宣教士；在登岸前，他先把他們放在一艘土人的船，該船暗地裏駛上呼格里河(Hooghly River)，然後在加爾各答登陸，這些宣教士安然登陸了。

克利害怕被加爾各答政府抓去，因此他不得不穿過猛虎出沒的沼澤而退到內陸去。不久，好消息來了，一個在加爾各答的英國人喬治·阿德尼(George Udney)請克利來幫他料理一間藍靛染料工廠，喬治給他有足夠的薪俸維持家用，也有空餘的時間來作宣教的工作。

克利安頓下來後，便開始研究孟加拉語和梵文，以及幾種其他印度土話。他把新約譯成孟加拉文-----印度最普遍的語言，直到那時，孟加拉語才能成爲可書寫的文字。

經過悠悠七年之久克利才有第一個信徒受浸，這期間，他的太太發了神經病，要與其他的宣教士隔離。一八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堅守不渝的克利替一個印度教的木匠訖哩史那·帕爾施浸；不久他的兒子腓力斯卻做了宣教士。但他的喜樂很快又消失了，他的同工多馬醫生被逼要到加爾各答一間收容所去服務。

在印度，塞蘭浦耳的丹麥當局邀請他負責他們殖民地新語言的出版事業，印度的總督對克利的翻譯工作十分激賞，亦重聘他在塞蘭浦耳附近新建立的威廉堡學院任孟加拉文和梵文教授，這些工作使克利有更優厚的薪俸，但他全數奉獻在一般的宣教工作上。

這個苦幹的人仍不斷地埋頭苦幹，除了在大學裏教授和在宣教事工的督察外，他把全部聖經譯成印度四種重要的語文，並引導其他人把聖經譯爲三十二種其他的亞洲語文，他是第一個人發行印度語文的報紙，此外他也出版了東方古典文學作品的英譯本，文法書和厚厚的字典等。

克利與兩種當地的迷信厲害地爭鬥，他們看一個有病的嬰孩是受了蠱惑的，因此村民便放他在空曠的地方讓他慢慢地死去，這宣教士說服英國當局要定此行爲是屬於謀殺，才遏阻了這種陋習。殉葬-----奉印度教的寡婦要被放在她死去的丈夫的火葬堆上活活燒死-----也使他的心沉重了好幾年，直到最後他終能使政府也取締了這種殘忍的習俗。

這個「爲神作大事」的人幫助了一百二十六間基督教宣教學校和一間印度宣教學院的建立，而更要緊者是他啓迪了英國與美洲的基督徒要爲基督的緣故展開全球的佈道計劃。因此克利實堪稱爲「近代宣教運動之父。」

這個曾爲補鞋匠，後卻使三百億人能讀自己言語的聖經的神僕，當他在心愛的印度垂危病榻時，低聲說：「神成就了何等的事啊！」他對最後一個訪客微弱而真摯地說：「當我離開後，別提及克利博士-----多傳揚克利博士的救主吧！」

他死後，加爾各答的報紙和全世界的基督教領袖均同聲褒揚他的偉大，在他的墓碑上正是刻著他一生的座右銘：

向神求大事
爲神作大事